

老駱駝邁步綠洲：

(本文插圖刊第58頁)

我的寫作生涯

●張恨水

我取名恨水的由來

七十年來，我當記者和寫章回小說的生涯佔了五十年。有人問我是怎樣當新聞記者的，我想若和今天的同行們比，我們那一代只能以駱駝比飛機了。不只肩負的使命不同，生活也不同。至於章回小說，我也學着寫了好幾十部，只能算是章回小說「匠」，不敢稱「家」。一部分書當年也曾風行一時。但今天回想起來，我那些書若是經時代的篩子一篩，值得今天的讀者再去翻閱的，也許所剩不多了。

現在且不說我的小說，留着下面去談。我先寫自己的生活過程，由此讀者也可以知道我寫小說汲取材料的源泉。我南南北北地走過一些路，認識不少中下層社會的朋友，和上層也沾一點邊，因為是當記者，所見所聞也自然比僅僅坐衙門或教書寬廣一些，這也就成爲我寫章回小說的題材了。

我祖籍安徽潛山，一八九五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江西廣信（上饒一帶），原名張心遠，筆名恨水。爲什麼叫「恨水」呢？這也使許多

朋友奇怪，爲什麼別的不恨，單單恨水呢？這是因爲我年輕時，很喜歡讀南唐李後主的詞，他的《烏夜啼》裏有一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我覺得這句很好，就取了個「愁花恨水生」的筆名。後來在漢口小報上投稿，就取了「恨水」作筆名。當了記者以後，這就成了我的正名，原來的名字反而湮沒了。名字本來是人的——個記號，我也就聽其自然。可是有許多人對我的筆名有種種揣測，尤其是根據《紅樓夢》中「女人是水做的」一說，揣測的最多，其實滿不是那回事。

髫齡仿作武俠小說

由於父親早年在江西卡子上作稅務工作，因此我的童年是在江西度過的。

當我十歲邊上，我父親接我們到新城縣去（新城後改名黎川縣），坐船走黎水直上。途中遇到了逆風，船上的老板和伙計一起上岸背繃，老板娘看舵。我在船上無事，只好睡覺。忽然發現船篷底下有一本綉像小說《薛丁山征西》，我一瞧，就瞧上了癮，方才知道小說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家裏請了一位先生，這位先生也愛看小說

，他常帶一本《三國演義》來，我有機會也拿起來看一看。我又在父親桌上找到了洋裝的《紅樓夢》，我讀了造大觀園一段，懶得再看，我正要

看打仗的書呢？這以後我就成了小說迷。我把零用錢積攢下來，够個幾元幾角，就跑到書鋪子裏去買小說書。有時父親要審查，他只准我看《儒林外史》、《三國演義》之類，別的書往往被扣留，有時還要痛罵一頓。於是我就把書鎖在箱子裏，等着無人的時候再拿出來看。尤其是夜裏看最好，大家睡了，我就把帳子放下，把小板凳放在枕頭邊，在小凳上點了蠟燭，將枕頭一移，把書攤開，大看特看。後來我父親知道了，每晚都要查上一查，他說十二點以後該睡覺了，在床上點蠟燭太危險；這時他對我說看小說也不大反對，索性管我叫「小說迷」，我母親也不管了。漸漸地我有了兩三書箱的小說書。

我十一歲時，祖母在故鄉死了，父親帶了我返里。家裏有殘本的《希夷夢》、《西廂記》、《六國誌》（寫孫龐鬥智）等。不久我們又回南昌，這時我十三歲，開始學着寫小說，在一個本

子上寫以小俠爲主人的小說，因爲我這時看的小說以武俠爲大宗。我寫的小俠使用兩把銅錘，重有一百多斤，一跳就可以跳過幾丈寬的濠溝，打死了一只老虎。我這樣寫小說，有誰看呢？只有我兄弟，我妹子下學回來無事，各端把矮椅子將我圍住，聽我講書，講的就是我自編的小說，他們居然聽得很有味道。因爲我寫小說以後才發現寫了兩三天，拿來給他們講解時，不到一小時就完了。我自己感到這是一個供不應求的艱巨工作。

我還記得，這個稿本，是竹紙小本：約有五寸見方，我用極不工整的蠅頭小楷，向白紙上填塞。有時覺得文字敘述還不够勁，我特意在裏面插上兩幅圖畫。所畫的那位小英雄，是什麼樣子，我也印象不清了，只是那兩柄銅錘，却誇張地畫得特別大，總等於人體的二分之一。那只老虎，實在是不像，我拿給弟妹們看時，他們說像狗。這給予我一個莫大的嘲笑，恰成了那個典：畫虎類犬了。

由經館到學堂吟詩

回到南昌以後，我父親在新淦縣三湖鎮找到了工作。這裏有一道漳江，兩岸都栽了橘子樹，我的家就像埋在橘子林裏。我在家裏學了一些八股文。我作過「起講」，也學了詩，懂了平仄，學作過五絕。我記得在「兩個黃鸝鳴翠柳」一題裏，我有這樣十個字：「枝橫長岸北，樹影小橋西」。後來我懂一點詩，覺得這根本不合題。但我初學作詩，確是這樣胡亂堆砌的。這作風，大

概維持了兩三年之久。我到了三湖，覺得在這裏住家非常的好，這裏有大河激浪，橘樹常綠，心想如此詩境多麼好，就從這裏學起詩來吧。我就常在橘林邊的白沙堤上散步，堤外有一道義渡，堤上有一座小小的塔，比在城市小巷裡接近大自然得多了。

這時我父親要我在古文上下點功夫，再送我上學堂。正有一位古文很好的蕭先生在附近開設了一座經館，父親就送我去念書了。在從前，父命是不能違抗的。這經館周圍的风景比我家還美，四周全是橘子林，門口有一條石板路，閃開一片大空場，場裏有水井，橘林外便是漳江，經館是姓姚的一個祠堂，院裏有兩棵大樹，若是晴天，太陽穿過大樹，照見屋裏碧油油的。最妙的是蕭先生收了一個姓管的學生，他們家裏買了許多小說，我們在一個房間攻讀，他和我要好，常把書帶來借給我。我就這樣讀了不少章回小說，無形中對章回小說的形式和特點有了一體會。

在經館裏讀了一年書以後，我已十四歲了，父親又把我送入學堂。這時我不只看小說，還看書評。不過，那時候的書評，沒有後來風行的書評那麼尖銳和細緻，但是也可以幫助我懂得那樣書好那樣書壞了。譬如白話小說《兒女英雄傳》我就看着他的言詞句子不錯，但對人物刻劃就差一些了。

那時候，商務印書館出了《小說月報》雜誌，我每月買一本，上面有短篇長篇創作，有翻譯小說，使我受益非淺，於是我懂得買新書看了，跳出了只看舊小說的圈子，也可以算作一種躍進

吧。我仔細研究翻譯小說，吸取人家的長處，取人之有，補我所無，我覺得在寫景方面，舊小說中往往不太注意，其實這和故事發展是很有關的。其次，關於寫人物的外在動作和內在思想過程一方面，舊小說也是寫得太差，有也是粗枝大葉地寫，寥寥幾筆點綴一下就完了。尤其是思想過程寫得更少。以後我自己就盡力之所及寫了一些

我在學堂裏讀了一陣書，父親又把我送到南昌敬賢門外的甲種農業學校去讀書，但是不到一年，父親去世了，母親就帶了我們子女回安徽潛山鄉間老家，我的學校生活也中止了。我很憂愁，但是讀小說的習慣却依舊。我那年十七歲，寫了一篇四六文章的祭文，大胆地爲父親除靈舉行家祭的靈堂上宣讀起來，把稿子也焚化了。我這時有些自負，對鄉間那些秀才貢生不怎樣看得起，沒有什麼朋友。家中有一間書屋，窗外有桂花樹，我常臨窗讀書，同鄉人因而送了我一個外號，叫我「大書箱」，意思是我只知念書。我那時真是終日吟詩，很少過問身外之事。

小說讀多碼頭跑多

我在鄉間過了半年多，有一個叔伯哥哥叫張東野，筆名張愚公（解放後曾任合肥市副市長，全國人大代表），當時在上海警察局當區長，他覺得我不讀書未免可惜，就叫我到上海去，打算讓我讀書。我到了上海之後，他打聽到蘇州辦了一個蒙藏墾殖學堂，我去考中了，就在蘇州住下來，這也爲我日後寫小說寫了一些蘇白進去打了

底子。

藝殖學堂就在蘇州留園的隔牆，到寒山寺和虎丘都近。我那時是個貧寒學生，也不敢亂跑，課堂是樓房，打開窗戶，附近人家，麥地桑田，小橋花巷，都在目前。我在課餘就拿了書本靠在紅欄杆之旁細細地看。這時期我讀了《隨園詩話》、《白香詞譜》、《全唐詩合解》等。樓底下是花園一角，我也常去玩，高興起來就題幾句詩。

我在蘇州讀書，當然很好，可是我沒有錢用，於是想起投稿來。我試寫了兩篇短篇小說，一篇叫《舊新娘》，是白話的；另一篇叫《梅花劫》，是文言的。這時大概是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當時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並不十分懂得什麼叫「劫」，什麼叫新舊，姑且一寫就是了。稿子寫好了，我又悄悄的付郵，寄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輯部。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只是寄出去而已，並沒有任何被選的幻想。可是事有出乎意外，四五天後，一封發自商務印書館的信，放在我寢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的將它拆開。奇怪，裏面沒有稿子，是編者懽鐵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說，稿子很好，意思尤可欽佩，容緩選載。我這一喜，幾乎發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雜誌上寫稿，我的學問一定是很不錯呀！我終於忍不住這陣歡喜，告訴了要好的同學，而且和懽先生通過兩封信。但是我那兩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到懽先生交出《小說月報》給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是十年年頭，也沒有露面。換句話說，是丟下字紙簞了。這封

信雖然是編輯部對一般作者的覆信，但是對我的鼓勵却很大，後來我當了五十年的小說匠，他的這封信是對我起了作用的。

我在藝殖學堂讀了一年書，正值二次革命起來了，我們這學校是國民黨辦的，所以也成了討袁軍的一支力量，把寫了「討袁軍」字樣的旗子掛起，可是沒有幾天就垮台了，學校也就解散。

這樣一來，我又失學了，可是我還沒有死心，帶了四、五元錢去南昌，找了一個補習學校補習英文、算術。想考大學，但是家中沒錢，父親過去在南昌置了點房產，所收房租只够我付補習學校學費的，借債不是個長局。後來母親把屋子賣了八九百元錢，由她收管度日，我不便拿。爲了找出路，我就帶了一包讀書筆記和小說到漢口去了，因爲有個本家叔祖張厚草在小報館裏當編輯。他雖然大我兩輩，年齡却比我大得有限，他認爲我的詩還不錯，就叫我投給幾家報館，但是並不給稿費，當時的小報館都窮得很，於是我的詩開始問世，却還沒發表小說。

這時，我的堂兄張東野已到長沙改行演話劇，取了個藝名叫張顯顯，而且演得很紅。不久他也到漢口來，在漢口沒演成，又要到常德去，我於是也隨他到湖南去了。

我堂兄在常德參加的那個話劇社裏有兩位知名的話劇家，一位是演生角的李君磐，一位是演旦角的陳大悲。我去了也參加演出，頭一場演《落花夢》，派我一個生角，是個半重要的角色，大家認爲我演的還不錯，就是說話太快了一點，派戲人說，演演就好了，我聽了也很高興。初步

定了我三十元的月薪，李君磐和陳大悲也不過百多元。不過薪金是有名無實的，我從沒拿過三十元，十元也沒拿過，但是伙食很好。我的另一件工作是編說明書，一張說明書不過三五百字，沒有什麼爲難，我的工作不忙，有時就約朋友出城去玩。

混到陰曆年邊，劇社就派了一個分班到津市去演出，我也去了，在這個小碼頭上演，生意却很好。兩個月後又到豐縣，在這裏演了兩個月，好消息來了：袁世凱死了，我們全班人馬要到上海去演戲，我分了三十多元薪金，够我到上海去的路費了。

到了上海，有個蕪湖《皖江報》的編輯郝耕仁和我堂兄住在一起，他大我十歲，是前清一個秀才，寫得一筆好字，能詩能文，他看我一點點年紀，和我堂兄一路階跑階混，認爲究竟不是路子，他勸我，既有這番筆墨，可以到內地去找個編輯做做。這番話給我相當影響，但是一時沒有辦法。我隨了李君磐的戲班到了蘇州，可是因爲我蘇州話說不太好，只得又隨另一批人南昌去演戲，仍舊窮得混不下去，我就借了路費回了安徽老家。

我回家時二十二歲，自己打算讀些書再找工作不遲。於是家中百事不問，一逕地看書。也試寫了幾篇小說，有《紫玉成烟》、《未婚妻》等，都是文言的。

過年以後，接到郝耕仁來信，約我一起去賣藥。郝的理想是渡長江，穿過江蘇全境，進山東，再去北京。至於藥，他家有祖傳的，沿途還可

以買，不用發愁。我正無事可做，心想跑跑長途也好。到三月初，我和他在安慶會面，就同行到了鎮江，又坐到仙女廟的船過江。仙女廟是個小鎮市，我們在一家小客店落脚，臨近就是運河，有一道橋通到揚州，那晚月色很好，我們倆在橋上閑步，看到月華滿地，人影皎然，兩岸樹木村莊，層次分明。有漁船三五，慢慢地往身邊走，可是隱約中不見船身，只見漁燈，從這裏順流而下。郝耕仁說，這裏很好。他要吟詩，於是就亂吟一陣。眼見月亮西斜，我們才回小客店。第二天我們到邵伯鎮去，只有二三十里路程，當然是步行而去，這日天氣很好，我們背了小提箱，且談且走，村莊裏樹木蔥蘢，羣鳥亂飛，田野中麥苗初長，黃花遍地，農民背着斗笠，在麥地裏幹活。

原來邵伯鎮很繁盛，鎮上什麼東西都有的賣。我們在一家旅館歇下，旅館經理是個小官。門口兩個長腳燈籠上寫着「九門都統」銜，分明是個北京官了。我們寫店簿的時候，在職業項下填了一個「商」字，茶房不信。回頭經理也來了，他說我們雖然是送藥來賣，可是要找個保才行。郝耕仁出去找了一個西藥店的經理，把這番出來賣藥的經過談了，那位經理很同情，但是他勸我們不必遠行了，說這一帶是給軍人統治，要小心些，最好還是回去為妙。他替我們作了保，還借給了路費，我們就在次日離開了邵伯鎮返回南方。

我們又想到上海去看看，就搭了一種「鴨船」，就是船頭上堆滿了鷄鴨籠子的船，風把鷄鴨

屎的臭味直送向乘客，蚊子也多得沒法撲打。我說出門真難。郝耕仁說這不算什麼，昨天我們在旅館裏的時候，茶房就輕輕對我說，鎮上保衛團裏的人已經住到我們對過房間裏來，只要他們說聲「捉」，我們就得跟了走。我聽了說，這好險啊，想到這，鷄鴨齊叫，臭氣熏人，蚊子亂咬，也就不在乎了。鴨船到了通揚州的大河港口就靠了岸，他們鷄鴨在此等輪船運到上海，我們也在這裏投宿一家小旅館，是一間統艙式的茅草棚子，裏面架了成行的木板當床，被子很髒，還有膏藥的黑點子，跳蚤也多，但是比鴨船要好一點。我們就出了幾個銅板，安歇一晚。旅館老板大聲說，輪船要到第二天九點鐘才到，不忙，客人睡吧。我一覺醒來已經七點鐘，郝耕仁已到街上去。這種旅館是不供應水的，要洗臉漱口，須要到街口茶樓上去辦。郝耕仁與致很好，喝了酒，吃了豬肝，我吃了包子。我們上船較遲，在一個汽洞裏安身。在船上只能買豆腐乳下飯，統艙是不供菜的。

廿四歲開始當記者

在上海找不到出路，郝耕仁和我只好各自離去，他回蕪湖報館當編輯，我回家去自修。半年以後，郝耕仁給我來信，他要到湖南一個部隊朋友那裏去作事了，蕪湖《皖江報》編輯的事可以由他保我接任。我決計邊學邊作，就向母親要了四元錢路費動身到蕪湖去。

我的記者生涯開始了，這時我已二十四歲。《皖江報》的編輯張九皋領我會見了譚經理，他

們信得過郝耕仁，也就信得過我。分派給我的工作是我每天寫兩個短評，還要編一點雜俎，新聞稿子缺少，就剪大城市報紙，工作並不難。我初作頭一天怕不合適，把短評給經理看，他說得很好，我心想這一碗飯算是吃定了。另外幾個編輯是能編不能寫。當時張九皋月薪八元，李洪勛六元，曹某五元，給我也定了八元。一共就是我們四個人。在編輯部裏，張九皋自己在外面還辦了一個人工商日報，曹某在那裏兼校對。李洪勛在《皖江報》編地方新聞，照例各公署會給他一點好處。我倒也不在乎錢多錢少，好在伙食相當好，待我也客氣，我自己有個房間，可以用功，因此種種，我倒很安心工作。到了晚上，作好了兩篇短評，就和李洪勛上街去玩，吃碗麵，再來幾個銅板的熟牛肉。

李洪勛說：「你老兄筆墨很好，要是到大地方去，是很有前途的，何必在這裏拿八元錢一個月呢。」我說：「你這話也許不錯，但是要慢慢來，我碰了不少釘子，凡事要有一定的機會。」不久，報館裏知道我是待不長久的了，譚經理就給我加了四元月薪，還許願說，將來給我我在馬鎮守使那裏兼個差使。其實我對錢並不看得那麼重，我對譚經理說不必多心。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了，南北青年都很激動。我們也很關心，就在報上辦起周刊一類的東西，經理看着我們辦，並不說話。

報館裏除了我們四個編輯外，有一個人專收廣告，一個人專管財務，三個人搖機器。只有一架平版機，排字房裏有十來位工人，一天印個千

把份報紙，每日下午三四點鐘，就得等着看上海報，以便剪用。

上海的《民國日報》是國民黨辦的，有一個《解放與改造》副刊，我的第一篇小說就在那上面發表，一起是兩篇：《真假寶玉》和《小說迷魂遊地府記》，一共一萬多字。《民國日報》很窮，也是不給稿費的。後來出了書，名為《小說之霸王》。我在《皖江報》上寫的《皖江潮》長篇小說，因我去北京而中止。

我上北京，是一個叫王夫三的朋友鼓勵我去的。他在北京，因事南下時碰到我，保我能在北京找到飯碗。於是我就把皮袍子送進「當舖」當了，又蒙一位賣紙烟的桂家老伯借給我一些錢湊作路費，動身去北京了。

最後一塊錢飽眼福

到了北京，王夫三引我去見秦墨晒，這位老記者如今還健在。他先是給《時事新報》發電報，後來又當《申報》記者。秦表示很歡迎我，要我每天發四條新聞稿子，新聞來源他們那裏有，決定每月給我十元月薪，如果稿子多，還可以外加。王夫三替我表示，我來北方是爲了學習，目的不在錢。秦說：那就很好。於是先借我一個月的工資，我趕快寄還給蕪湖那位借給我錢的桂家老伯。

我住在會館裏，每月房飯也要十多元，一切不用自己操心，自己可以用功，我這時努力讀的是一本《詞學全書》。每日從秦墨晒家回來，就攤開書這麼一念，高興起來，也照了詞譜慢慢地

填上一闕。我明知無用，但也要學着玩。我的小說裏也有時寫到會館生活和人物，也寫點詩詞，自然與這段生活有關了。

一天我在交過房、飯費後，只剩下二元現大洋了，這一塊錢怎麼花呢？恰巧這時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三個人聯合上演，這當然是好戲，我花去了身上最後一塊現大洋去飽了一下眼福耳福。有一個朋友方竟舟以前也在安徽報館工作過，彼此熟悉，一天他對我說，你口袋裏的錢已經不響了，大概缺錢用了吧？有個朋友成舍我在《益世報》做事，想找一個人打下手，你去不去？我好在下午和晚上沒有事，很願意兼個差事，就答應了。經他介紹我就認識了成舍我。成又給我介紹了經理杜竹萱。《益世報》是天主教辦的報紙，所以杜說，在新聞和評論方面只要不違背天主教就行，此外隨便說什麼都可以。至於我的工資，規定是三十元一個月。

《益世報》當時在新華街南口，除了總編輯成舍我外，有吳範寰之盛世弼、管窺天和我幾個編輯，還有兩個校對，另有主筆一人，每天做一篇社論。社址有三進房屋，前面一排是營業所，有兩個人收廣告管財務。中進是排字屋，有二十幾位工人，還有兩架平版機和一架小機器，兩側是堆紙的屋子。經理室、編輯部、廚房全在後進。新聞和副刊全在這裏編。要說是每天出兩張大報，這點屋子真不算多，尤其是比起今天的報社來，就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當時其他的報，往住是只租一所小小的屋子，門口掛一個木牌，就算報社了，其報紙大都是找印刷所代印的。

我在北京《益世報》大約幹了一年，因爲我在業餘時間朗讀英文，同院住的經理的新太太嫌吵，就把我調任天津《益世報》的駐京記者，每兩天寫一篇通訊，這樣就離開北京《益世報》館。到後期我的月薪加到七十元一月。

當秦墨晒作《申報》駐京記者時，他還兼着「遠東通訊社」的事，每月送他六十元，他忙不過來，就約我分担一半。後來他又湊了個孫劍秋，辦了個「世界通訊社」，約我作總編輯。我是一個不會跑腿的人，通訊社的消息從那裏來呢？秦墨晒雖然答應我從他那裏挖一點去，但是我想他還是從別人那裏挖消息的，豈能讓我再挖。我暫時只好答應。我先後住過王夫三的會館和潛山會館，這時就搬到通訊社裏去住。

通訊社也就是供稿社。當年大凡一個人在政治上有點辦法，就拿出幾百元辦個通訊社，此外每月還要二百多元經費。主辦「世界通訊社」的經濟後台老板是張弧——當年的財政總長。他究竟爲辦通訊社花了多少錢，我也不清楚。我當總編輯，每月支二十元，只能吃飯。每天的頭條新聞却是煞費心思的，因此我在通訊社裏始終抱一個五日京兆的意思。

後來成舍我和我們全部離開了《益世報》，成舍我混進了衆議院當祕書。我辭了「世界通訊社」的工作，給《新聞報》、《申報》寫通訊，我的新聞來源也往往是在去找成舍我想辦法。他一度辦了個「聯合通訊社」，我又去幫他的忙。成和楊瑞結了婚，家用大了，他又弄到了教育部祕書的職務。成舍我是個不甘寂寞的人，精力充沛

，從新聞界跳入政界，在政界又兼辦新聞。不久，他又辦了一張《世界晚報》，讓我包辦副刊，我給這副刊起名叫《夜光》。我只支三十元月薪，樣樣都得自己來，編排、校對，初期外稿不多，自己要寫不少。

『春明外史』小說問世

我編《夜光》很起勁。不到三十歲，混在新聞界裏幾年，看了也聽了不少社會情況，新聞的幕後還有新聞，達官貴人的政治活動、經濟伎倆、艷聞趣事也是很多的。

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寫《春明外史》的打算。「春明」是北京的別稱。小說從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開始在《夜光》上發表，每天寫五六百字，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才登完，其間凡五十七閱月，約有百萬字。最後由世界書局印行，全書分十二冊，頭二集也分別在北京出版過，但也不過只印幾千本就是了。世界書局在全書出版前，在《申報》、《新聞報》登了兩檔廣告，把八十六回回目一齊登了出來，定價十元零八角，一印起碼上萬部，不久又再版，又印縮版，縮版是改五號字，印成兩本，定價兩元多錢。我是賣了版權的，所以出多少版費，與我也沒關係了。朋友們關心我，說「你後悔了吧」，我說，我不後悔。我沒有世界書局那麼多的本錢，也沒有本領在許多碼頭開設支局。

《春明外史》是以記者楊杏園的生活為中心的，也可以說多多少少有些傳記小說的味道，一開頭就交代楊杏園是皖中的一個世家子弟，喜歡

寫詩填詞，發洩滿腹牢騷，「却立志甚佳，在這部小說裏，他却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呢」。自然，這個「志」，是不能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的。書的前半部寫了楊杏園和青樓中的清倌人梨云的戀愛，但是他還沒有決心娶她，也沒有可能為她贖身，終於在「滿面啼痕擁衾倚綉榻，載途風雪收骨葬荒邱」的第二十二回裏讓梨云染病死去。

書裡寫的楊杏園對梨云十分多情，在她死後，還常在自己會館裏的桌子上供她的像片和瓜果。一直到書的結尾，楊杏園也沒有成家，而且短壽而死。

許多朋友問我：你真認識過梨云這麼一個清倌人嗎，你真對她那麼痴情嗎？真有李冬青那麼個人嗎？還有人問，某人是否影射着某人？其實小說這東西，究竟不是歷史，它不必以斧敲釘，以釘入木，那樣實實在在。《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諱言的，是當時社會上一羣人影，但只是一羣人影，決不是原班人馬。這有個極好的證明，例如主角楊杏園這人，人家都說是我自寫，可是書中的楊杏園死了，到現時我還健在。宇宙裏沒有死人能寫自傳的。

《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這條路子。但我覺得這一類社會小說犯了個共同的毛病，說完一事，又遞入一事，缺乏骨幹的組織。因之寫《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個主角，並安排下幾個陪客。這樣，說些社會現象，又歸到主角的故事。同時，也把主角的故事，發展到社會的現象上去。這樣的寫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過這對讀者，還有

一個主角故事去摸索，趣味是濃厚些的。當然，所寫的社會現象，決不能是超現實的，若是超現實，就不是社會小說了。

《春明外史》，除了材料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為人所喜於討論的，就是小說回目的構制。因為我自小就是個弄詞章的人，對中國許多舊小說回目的隨便安頓，向來就不同意，既到了我自己寫小說，我一定要把它寫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經一番研究。我自己創足適履地定好了幾個原則。一，兩個回目的上聯要能包括本回小說的最高潮。二，盡量求其詞華藻麗。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渾成的，如以「夕陽無限好」，對「高處不勝寒」之類。四，每回的回目，字數一樣多，九字回目，求其一律。五，下聯必定以平聲落韻。這樣，每個回目的寫出，倒是能博得讀者推戴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往往兩個回目，費去一二小時的工夫，還安置不妥當。因為藻麗渾成都辦到了，不見得能包括這一回小說最高潮。能包括小說最高潮，不見得天造地設的就有一副對子。這完全是求好看的念頭，後來很不願意向下做。不過創格在前，一時又收不回來，因之這個作風，我前後保持了十年之久。但回目作得最工整的，還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其它小說，我就馬虎一點了。在我放棄回目制以後，很多朋友反對，我解釋我吃力不討好的緣故，朋友也就笑而釋之了。謂不討好云者，這種藻麗的回目，成為「禮拜六派」的口實。其實「禮拜六派」，多是散體文言小說，堆砌的詞藻，見於文內，而不

在同目內。「禮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說的，但他們的回目，也很隨便。不過，我又何必本末倒置，在同目上去下工夫呢？

《春明外史》發行之後，它的範圍，不過北京、天津，而北京、天津，也就有了反應的批評。有人說，在五四運動之後，章回小說還可以叫座，這是奇蹟。也有人說，這是「禮拜六派」的餘毒，應該予以掃除。但我對這些批評，除了予以注意，自行檢討外，並沒有拿文字去回答。在五、四運動之後，本來對於一切非新文藝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說，不論它的前因後果，以及它的內容如何，當時都是指為「鴛鴦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並不腐化，為什麼甘心作「鴛鴦蝴蝶派」？而我對於這個派不派的問題，也沒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實最為雄辯，還是讓事實來答覆這些吧！

《世界晚報》辦了一年多，《世界日報》才問世。成舍我覺得晚報總不如日報神氣，就找到了一些搞政治的人出錢支持他，除了買兩架平版機、小機器、石印機以外，還有每月的經常費。手帕胡同的房屋不多了，我找了石駙馬大街的房子，也就是解放後《光明日報》社的一部分，再往後還買過西長安街的一座旅館屋子，現在已經拆掉了。

《世界日報》出兩張，編輯部裏有了十幾個人。副刊《明珠》仍由我包辦，我同時仍編晚報的副刊《夜光》，忙不過來，就另請了張友漁、馬彥祥、朱虛白、胡春冰四位一起辦副刊。

我在《世界日報》發表小說《新斬鬼傳》，

還有《金粉世家》。後者和《春明外史》一樣，出書時都印成十二本，約一百萬字。在《世界日報》刊登時，都沒有拿到多少錢。因為那時成舍

我常到南京國民黨政府那裏去奔走，後來在南京辦了一個《民生報》，把《世界日報》的財務交給給他太太楊璠，大家要錢用，就到楊女士那裏去支，但當時報館發不出月薪，我們只能領一點零錢，其餘的由楊女士給我們開一張欠薪的借條，這樣做不止一回。我認為成舍我是我們的朋友，他欠了我們的薪水，有了錢自然會還，還要他太大的借條幹什麼呢？我就把借條扯碎了。過了一年多，北伐後成舍我回到了北京，我向他算這筆舊賬時，他說：「借條呢？」我說：「我扯碎了。」他說：「那就不好辦了！」我自然沒有辦法。

這時《益世報》和《晨報》也要我寫小說發表，既然《世界日報》欠着我薪水，我在編餘時間為外報寫小說，他們也不便干涉。我寫了《劍胆琴心》給《晨報》。這時《益世報》已江河日下，但是還有點人情關係，也給他們寫了一篇。萬枚子等友人辦北京《朝報》時，我又寫了《雞犬神仙》，該報不久停刊。這時，我因時間不夠支配，就把秦墨晒處的工作和天津《益世報》的通訊全辭掉了。又有人介紹我給上海有名的小報《晶報》寫《錦片前程》。我同時寫的幾篇長篇小說，怎麼進行呢？也沒有別的好辦法，只能先寫好每篇小說的人物故事提綱，排上輪流寫作的日表，今天寫《劍胆琴心》，明天就寫《錦片前程》，嚴格執行。關於《金粉世家》，那是天天

要寫的，裏面人物多、場面大、故事曲折，我也只好勾出個輪廓來，每天寫上七百字到上千字

《金粉世家》全書一百二十二回，世界書局出書時，又包了《申》、《新》二報的廣告檔，把回目全登上去，分兩日刊登。這書裏寫了金銓總理一家的悲歡離合，荒淫無恥的生活，以金燕西和冷清秋一對夫婦的戀愛、結婚、反目、離散為線索貫穿全書，也寫了金銓及其妻妾、四子四女和兒媳女婿的精神和面貌和寄生蟲式的生活。自然，也反映了當年官場和一般的中上層社會相

社會上有人猜想：我寫金銓一家是指當時北京豪門那一家呢？其實誰家也不是，寫小說不是寫真人真事，當然也離不了現實基礎，純粹虛構是不行的。用個譬喻，乃是取的「海市蜃樓」。海市蜃樓是個幻影，略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它並不是海怪或神仙布下的疑陣，而是一種特殊自然現象的反映。明乎此，就知道《金粉世家》的背景，是間接取的事實之影，而不是直接取的事實。作為新聞記者，什麼樣的朋友都結交一些。袁世凱的第五個兒子和我比較熟，從他那裏聽到過一些達官貴人家的故事。孫寶琦家和許世英家我也熟悉。有時我也記下一些見聞，也就成為寫小說的素材。

像冷清秋那樣的遭遇，我也是屢見不鮮的：一個出身比較平常的姑娘嫁到大宅門裏，也許是一時由於虛榮心作祟吧；但是，不是由於丈夫薄幸，就是由於公婆小姑妯娌瞧不起，慢慢地就會

出現裂痕，以悲劇結局。冷清秋也是由於金燕西的多角戀愛、揮霍無度、不知上進而上樓禮佛，終至在一場火災中抱了獨子出走，寫得似乎是沒有遁入空門，而是在西郊隱居起來。我沒有安排冷清秋死去，當年大約是為了安慰讀者的。但就全文命意說，我知道沒有對舊家庭採取革命的態度。在冷清秋身上，雖可以找到一些奮鬥精神之處，並不够熱烈。這事在我當時為文的時候，我就考慮到的。但受着故事的限制，我沒法寫那樣超脫現實的事。在「金粉世家時代」（假如有的話）後，那些男女，你說他們會具有現在青年的思想，那是不可想像的。後來我經過東南、西南各省，常有讀者把書中的故事見聞。這讓我增加了後悔，假使我當年在書裏多寫點奮鬥有為的情節，不是會給婦女們有些幫助嗎？

有人喜歡研究小說人物的名字來由，我有時喜歡用名字象徵性格，如冷清秋便是。有時却又改一改現實人物的名字，我有位叔祖名張厚草，在《春明外史》裏就借用它成了一個詩人的名字。

啼笑因緣趕上時代

到我寫《啼笑因緣》時，我就有了寫小說必須趕上時代的想法。這小說一九三〇年發表在《新聞報》上，是應嚴獨鶴先生之約寫的。記得我在寫《啼笑因緣》的第一天，是在中山公園小土山下水亭子邊構思的，當時一面想，一面筆記，就這樣勾畫出了這本書的輪廓。而這時土山上正有幾個姑娘在唱歌呢。當然，我的所謂趕上時代，只不過我覺得應該反映時代和寫人民就是了。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閥們為非作歹的事情太多了，就是新聞記者也可以隨意捉去坐牢槍斃。於是我寫了以學生樊家樹和唱大鼓書的姑娘沈鳳喜的愛情，和他們被軍閥劉將軍拆散的故事。最後，這個姑娘被劉將軍逼瘋了，遭到了悲劇的下場。

因為上海《新聞報》和我初訂契約，我想像《春明外史》那樣的長篇是不合適的，於是我就想了這樣一個不太長的故事。在那幾年間，上海洋場章回小說，走着兩條路子，一條是肉感的，一條是武俠而神怪的。《啼笑因緣》和這兩種不同。另一點是《啼笑因緣》中對話用的是北京話，與當時上海的章回小說也不同。因此，在這部小說發表的起初幾天，有人看了覺得眼生，也有人覺得描寫過於瑣碎。但並沒有人主張不向下看。載過兩回之後，讀者感到了興趣。嚴獨鶴先生特地寫信告訴我，讓我加油。一面又要求我寫進一些豪俠人物，以增加讀者的興趣。對於技擊這類事，我自己並不懂，而且也覺得是當時一種濫調，我只能把關壽峯和關秀姑兩人寫成近乎武俠的行爲，並不過分神奇。這樣的人物是有的。但後來還是有人批評《啼笑因緣》的人物說，這些描寫不真實。此外，對該書的批評，有的認為還是章回小說舊套，加以否定。有的認為章回小說到這裏有些變了，還可加以注意。大致地說，主張文藝革新的人，對此還認為不值一笑。溫和一些人的人，對該書只是就文論文，褒貶都有。但不管怎麼說，這書惹起了文壇上很大注意，那却是事實。有人並說，如果《啼笑因緣》可以存在下去，那是被揚棄了的章回小說又要還魂。我沒有

料到這部書會引起這樣大的反應。當然我還是一貫地保持緘默。我認為被批評者自己去打筆墨官司，會失掉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精神，而徒然攪亂了是非。後來《啼笑因緣》改編成電影，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片社為爭奪拍攝權打了一年的「啼笑官司」，在社會上熱鬧了一陣，連章士釗先生也曾被聘請為律師調解訴訟。不過這些批評和紛爭，全給該書做了義務廣告。《啼笑因緣》後來還曾多次被搬上銀幕和舞台。它的銷數超過了我其它作品，所以人家說起張恨水，就聯想到《啼笑因緣》。

這本書發表後，許多讀者來信詢問主人翁的下落，要求寫續集，無法一一回信作答，因此我後來寫了一篇《作完《啼笑因緣》的說話》，其中說：「《啼笑因緣》萬比不上古人，古人之書，尚不可續，何況區區……《啼笑因緣》自然是極幼稚的作品，但是既承讀者的推愛，當然不願它自我成之，自我毀之。若把一個幼稚的東西再幼稚起來，恐怕也有負讀者之愛了。所以歸結一句話，我是不能續，不必續，也不敢續。」

過了三年，由於讀者的愛好，我自己沒有續，却出現了一些由別人寫的《續啼笑因緣》、《反啼笑因緣》、《啼笑因緣零碎》……等等。全都是違反我本意的。為了這個緣故，我正躊躇着，原來印書的三友書社又不斷來催促我續著。當時正值日軍大舉進攻東北，我想如果將原著向其它方面發展，也許還不能完全算是蛇足。所以在續集中寫了民族抗日的事。但至今回想起來，就全書看還是不續的好。抗日的事可以另外寫一

部書嘛。

賣版稅辦美術學校

有了以上幾部稿子，我受到了上海出版商的注意，他們約我到上海去訂合同，預約我的小說出版。去滬以後，招待歡迎，走時歡送。稿費從優，但是我一般全是賣版稅，書印若干萬冊或若干版，與我無干。記得在上海先看見了編《紅玫瑰》雜誌的趙君狂，他又給我引見了世界書局經理沈知方，我一次預支了稿酬八千元，決定《春明外史》由他們第三次出書，《金粉世家》也由他們出版，再次就是正在上海《新聞報》刊登的《啼笑因緣》了。這時我有錢了，就寫信給郝耕仁，叫他到上海來玩玩。他來了，我分給他一些錢，又同路去逛西湖。郝耕仁這時還勸我節約一些，別把心血換來的錢全虛擲了。我回到北京以後，手上還有不少錢，雖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首先我把弟妹們婚嫁、教育問題解決了一部分。又租了一所屋子，院子很大，植了不少花木，很幽靜。這一切，在精神上，對我的寫作是有益的。

這時我很忙，我算了一下，約有六七處約稿，要先後或同時寫起來。我因此閉門寫作了一年。每天我大概九點鐘開始寫作，直到下午六七點鐘，才放下筆去吃晚飯，飯後稍稍休息，又繼續寫，直到晚上十二點鐘。我不能光寫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後，我又必擁被看一兩點鐘的書。看的書很拉雜，文藝的、哲學的、社會科學的，都翻翻。還有幾本長期訂的雜誌，也都看看。我所

以不被時代拋得太遠，就是這點加油的工作不間斷的緣故。否則我永遠落在民國十年以前的文藝思想圈子裏，就不能不如朱慶餘發問的話，「畫眉深淺入時無」了。這時，我讀書有兩個嗜好，一是考據，一是歷史。爲了這兩個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和尚，發了個心願，要作一部中國小說史，要寫這部書，不是光在北平幾家大圖書館裏可以把材料搜羅全的。自始中國小說的價值，就沒有打入四部、四庫的範圍。這要民間野史和斷簡殘編上去找。爲此，也就得多轉書攤子，於是我只要有功夫就揣些錢在身上，四處去逛舊書攤和舊書店。我居然找到了不少。單以《水滸》而論，我就找了七八種不同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胡適就曾說很少，幾乎是海內孤本了。我在琉璃廠買到一部，後來在安慶又買到兩部，可見民間蓄藏是很深厚的。由於不斷發掘到很多材料，鼓勵我作小說史的精神不少。可惜遭到「九一八」大禍，一切成了泡影。材料全部散失，以後再也沒有精力和財力來辦這件事。

那幾年由於著作較多，稿費收入也就多些。這時因我四弟牧野是個畫師，邀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辦了個「北華美術專科學校」。我不斷幫助他一點經費，我算是該校董事之一。後來大家索性選我做校長。我雖然有時也畫兒筆，但幼稚的程度比小學生描紅模高明無多。我雖擔任校長，並不教畫，只教幾點鐘的國文。另外就是跑路籌款。記得當時在「北華美術專」任教的老師有于非闇、李苦禪、王夢白等先生。後來一些在藝術上有成就或在社會上知名的人如張行、藍馬、

張啓仁等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兩遊西北擴大眼界

關門寫小說一年以後，我有了西北之行。一方面是，自寫《啼笑因緣》以後，我有了趕上時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深知寫小說不多了解一下老百姓的事是不行的。這時正是很多人熱心西北的時節，爲了西北地廣人稀，有豐富的資源待開發。當時隴海鐵路只通到潼關爲止，再向前就得坐汽車了。

我在家籌劃了一個多月，就帶了一個小行李，在五月裏出發，我到鄭州、洛陽，一直到火車終點潼關爲止。我看了三省交界的黃河，倒是氣勢雄壯。省政府的汽車送我們到了西安。這時西安只有三十萬人口，也許因爲戰爭關係，實數還不到三十萬。邵力子先生時任陝西省長，他很幫忙，聽說我要去蘭州，說坐省裏公事汽車可以隨時上下，比商車方便。後幾天我搭上了西蘭公路劉工程師的車子，後面還有一部不帶篷的敞車。一路西行，要經過近二十個縣，除了平涼而外，就沒有有一個縣城像樣的，人口少，市面荒涼。比起我久居的江南來，這裏一個縣城不如江南一個村鎮。同車的劉工程師對我說：「你還沒到縣裏頭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服不周，十幾歲的閨女往往只以沙草圍着身子過冬，沒有褲子穿，許多縣全是如此。」

那時蘭州只有十四萬人口，建築很古老，算是當時的一個邊防城市。蘭州的人民生活也不見好。從這以後，我才覺得要寫人民的苦處，實在

有我寫不到想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說，讀萬卷書，走萬里路，擴大眼界，是寫小說的基本工作。

我從西北歸來，就寫了《燕歸來》，發表在《新聞報》上，又寫了《小西天》，發表在《申報》上。此行未去新疆。我國的版圖多麼大，我心想我這一生能跑得到麼！

《燕歸來》是寫一個女孩子自幼因逃荒從甘肅離家，後來在南京當了體育皇后，爲了開發西北，就和幾個男朋友由陝西大路歸來，找到了自己的家庭。故事人物是我在西北親見親聞的。西北人民生活水平之低是我以前都想不到的。

一九五六年文聯組織了一個作家藝術家參觀團，我隨團又遊歷了西北。這次看到西北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提高，整個的西北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鐵路線過了蘭州，公路四通八達，新建了許多工廠、礦山。使我非常興奮，也增長了不少見聞。有一晚，在蘭州玩得太高興了，誤了晚飯，同行十幾個人走到一家酒館裏，他們也已停止營業。有位朋友說：這是在寫《燕歸來》時沒遇到過的事吧，這次玩得太起勁了。櫃台裏站了一位老先生，聽了這話，對我望望，便對我說：「您從北京來嗎？是姓張嗎？」我說是的，他又說：「你的四六文章很好，我在《春明外史》裏見過。」我聽了真是受寵若驚。他又說：「第一次來與第二次來，有好多不同吧？」我笑說是，同行的人覺得老先生和我攀起交情來，吃飯有希望了，便向老先生央求做飯。老先生說：「張先生是稀客，開晚飯，有有有。」我們十幾個人上飯廳飽餐了一頓。這件巧遇不算稀奇。

。我的書能在二十年前西北交通不便的時候來到西北，是沒想到的事。

意識轉向宣揚抗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國難來了，舉國惶惶，我自己想到，我應該作些什麼呢？我是個書生，是個沒有權的新聞記者。百無一用是書生，惟有在這個時期，表現得最明白。想來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上，盡其所能吧。也就只有如此聊報國家民族於萬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開始寫抗戰小說。但是當時的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所以我盡管憤憤不平，却也沒有辦法，因此我所心嚮的禦侮文字，也就吞吞吐吐，出盡了可憐相。例如我在《彎弓集》中寫了幾首詩，就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六朝金粉擁千官，王氣鍾山日夜寒。
果有萬民過舊蜀，豈無一士復亡韓。
朔荒秉節懷蘇武，暖席清話愧謝安。
爲問章台舊楊柳，明年可許故人看。

含笑辭家上馬呼，者番不負好頭顱；
一腔熱血沙場洒，要洗關東萬里圖。

那時我在北平，在兩個月工夫內，寫了一部《熱血之花》和一個小冊子《彎弓集》，都是鼓吹抗戰的文字。當然這談不上什麼表現，只是說我的寫作意識，轉變了個方向，我寫任何小說，都想帶點抗禦外侮的意識進去。例如我寫《水滸別傳》，就寫到北宋淪亡上去。當然，這些表現

都是很微渺的，不會起什麼大作用，僅僅說，我還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罷了。

以後我又給上海《申報》寫了《東北四連長》（後易名《楊柳青青》）以及《啼笑因緣續集》等，都表現了抗日的思想。一九三五年秋，成舍我在上海創辦《立報》，我包辦其中一個副刊《花果山》。原想只幫助辦一個短時期，等有些眉目後就回北方。誰知北平家中來了急電，叫我不必回去。原來冀東已出現了日僞傀儡政權，迫害愛國的文化界人士，有一張黑名單，我也名列榜上，因而就不能北上了。

投資創辦南京人報

後來我又轉到南京，因爲老友張友鸞約我投資創辦《南京人報》，經他多方敦促，我們花了五千元買機器、字架和紙張，辦起報來，我並自編副刊《南華經》，自寫了兩部小說：《中原豪俠傳》、《鼓角聲中》。我辦《南京人報》，猶如我寫《啼笑因緣》一樣，驚動了一部分人士，出版第一日，就銷到一萬五千份。這時我還爲別的報寫了《太平天國逸事》、《天明寨》和一篇關於義勇軍的故事《風雪之夜》。不久「七七」事變發生，我把家眷送回潛山老家，攜帶了一個小行李卷離開南京去內地。由於冀東偽政權的出現，我不能回北平，又加上這次南京遭受轟炸，我隻身入川，因此我的全部財產和多年搜集的資料書籍也全部拋棄了。路過漢口時，全國抗敵文協成立，我被推選爲理事。接着我到了重慶。

這時南京《新民報》已經遷渝，張友鸞就向

陳銘德先生推荐我加入《新民報》，從此我就在《新民報》工作十餘年。當過主筆，也當過經理，也寫小說、詩、文在報上發表。入川後我寫的第一部小說《瘋狂》，就是在《新民報》上發表的。我在抗戰的前期寫了一些有關游擊隊的小說，如《衝鋒》、《紅花港》、《潛山血》、《游擊隊》、《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大江東去》等。那時，上海雖然淪為孤島，《新聞報》還不會落入漢奸之手，信件可以由香港轉，我就寫了《水滸新傳》，描寫水滸人物和金人打仗，因為寫了民族氣節，很受上海讀者的歡迎。

由於我對軍事是外行，所以就改想改變方法，寫一些人民的生活問題，把那些間接有助於抗戰的問題和那些直接間接有害於抗戰的表現都寫出來。但我覺得用平常的手法寫小說，而又要替人民呼吁，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之，我使出了中國文人的老套，寓言十九，托之於夢，寫了《八十一夢》，這部書是我在後方銷數最多的一部。《八十一夢》還在延安流傳。書裏的夢，只有十幾個，也沒有八十一個，何以只寫十幾個呢？我在原書楔子裏交代過，說是原稿潑了油，被耗子吃掉了。既是夢，就不嫌荒唐，我就放開手來，將神仙鬼物，一齊寫在書裏，諷喻重慶的現實。當時我住在重慶遠郊南溫泉，特工對我注意起來，認為張恨水「赤化」了，因此檢查我的來往書信。爲了這部書，有人把我接到一個很好的居處，酒肉招待，最後他問我：是不是有意到貴州息烽一帶（國民黨軍統特工監獄），去休息兩年？於是《八十一夢》就此匆匆結束了。這一期間我寫

了《偶像》、《牛馬走》（又名《魍魎世界》）、《傲霜花》（原名《第二條路》），以及連載隨筆《上下古今談》，都是談的社會現象，針砭當時的貪污腐敗。我還寫了《鄉居雜記》、《讀史詩》等，其中有一首諷刺詩「日暮馳車三十里，夫人燙髮入城來」之句，流傳很廣，各報頗有轉載的。

也獲抗戰勝利勳章

一九四四年在重慶，當我五十歲生日時，承抗敵文協、新聞學會、《新民報》一些友好熱心，爲我祝賀，同時紀念我寫作三十年。紀念會經我堅持免開，但是在幾種報紙上還是發表了一些文章，對我慰勉有加，實深銘感。其中以《新華日報》潘梓年的一篇最有意義，題目是《精進不已》，他根據我在重慶時期寫的文章，以爲我有明確的立場——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他說，明確的進步立場，是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立場不進步的人，看不見或看不清現實，寫出的東西也就對社會有害無益。他以其寫的《上下古今談》爲例，希望我不斷地精進不已，自強不息。我當時在《新民報》上寫了《總答謝》。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到重慶，得以會晤，他對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鼓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勝利以後，各報紛紛復員，《新民報》社派我到北平任北平版經理，我和三四位同事一同從陸路動身，由重慶到貴陽、衡陽都是坐汽車，由衡陽到武昌坐鐵棚子火車，沒有火車頭用汽

車拉了火車走，可算今古奇觀。一共走了三整天，到了漢口才乘船到南京，已是勝利後度第一個春節的時候了。我回到故鄉，看望了我的母親後，就匆匆北上。我把路上見聞寫了小說《一路福星》給《旅行雜誌》。這時，國民政府向一千多人頒發了「抗戰勝利勳章」，其中也有我。

回到北平看到偽書

我爲了和陳銘德先生北上辦《新民報》北平版，我以最大的犧牲，報答八年抗戰的友誼，把《南京人報》讓給張友鸞去辦了。一九四六年春我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北平，鄧季惺先生已把北平版的房子機器等安排好，我又邀請馬彥祥、左笑鴻、于非闇等老友一起合作，舊友重逢，再度共事，是非常融洽的。不久北平版籌備就緒，就在這一年四月四日出版，開始印一萬多份，不久增加到四萬多份，很受北平讀者歡迎，營業可以維持，不向總管理處要錢。我自編了副刊《北海》和《新民報畫刊》，同時還寫了幾部長篇小說。

到了北平，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在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有人冒我名出版小說，內容荒誕不經，黃色下流。我查了一查，這些偽書竟有一百多部，實在讓我大大的吃了一驚，對我是個惡意的侮辱，我十分氣憤，多次在報上發表聲明，並向主管部門申訴，才查禁了一下，聽說東北冒名的偽書尤其多。

在北平目睹耳聞不少接收大員的生活，社會上也有接收大員「五子登科」（房子、金子、女子、車子等）之說，我於是寫了《五子登科》的

小說。這一時期我還給《新民報》寫了個長篇《巴山夜雨》，又給上海《新聞報》寫了個長篇《紙醉金迷》，這兩部書都是以重慶為背景的，在別人看來，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我自己是作了一個深刻的紀念。這時的幣制是一直紊亂，物價是一直狂漲，對於國民黨的金融政策，誰也不敢寄予絲毫的信用，自由職業者，就非常的痛苦，尤其是按字賣文的人，手足無所措。月初，約好了每千字的稿費，也許可以買兩三斤米，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費的時候，半斤米都買不着了。在這種情形下，勝利後的兩年間，我試了一試賣文的生活，就戛然中止。《歲寒三友》、《馬后桃花》就是這樣未完篇的。到了一九四七年，紙價已經貴得和布價相平了。我就又改變作法，多寫中篇，如《霧中花》、《人跡板橋霜》、《開門雪尚飄》等，這一試驗，還算可以維持下去。

三千萬言點滴積成

因為我很不習慣報社的經理職務，一九四八年秋，陳銘德先生到北平，我向他辭去了報社的職務，專事寫作，從此終止了我從事四十年的新聞生涯。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了。我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歡欣。但對黨的政策也並不十分了解。這時我接到了一張請帖，到北京飯店參加宴會。會上葉劍英同志作了講話，使我對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同年夏，我忽然患腦溢血，癱瘓在床，喪失了工作能力，但是黨和人民政府對我的生活仍無微不至地關懷。我被聘為文化部的顧問，還被邀

請參加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和全國作家協會。以後我的病情漸漸好轉，恢復了部分寫作能力，我又應通俗文藝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新聞報》及香港《大公報》、中國新聞社之約，為國內外讀者寫了根據民間傳說改寫的小說《梁山伯與祝英台》、《白蛇傳》、《秋江》、《孔雀東南飛》以及《記者外傳》等。我為中國新聞社寫了北京城郊的變化，為此特意一一去看了北京三個城門附近的變化，當看到新建的平坦馬路和一幢幢新樓房，馬路邊栽滿了樹木，我感到十分高興。一九五二年寫了一組《冬日竹枝詞》，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

一九五五年，我的身體逐漸復原，雖然行動尚不方便，還隻身南下，看到了江南以及故鄉的變化，興奮不已，為香港《大公報》寫了一篇三四萬字的《旅行雜誌》。一九五六年從西北回來後我被邀為列席代表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二屆會議。政協經常組織我學習馬列、學習黨的政策，到各處觀光，使我的思想和眼界都為之大開。我解放前寫的《啼笑因緣》、《八十一夢》等小說都得到了再版，這些幾十年前的舊作，在黨的關懷下，再度問世，使我感奮交加。

一九五九年我的病情又加重了，再次喪失了寫作能力，周恩來知道後，對我的生活和工作非常關心，不久我就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我的生活有了保證，使我能够在晚年，盡力之所及作一點工作。

回顧我的五十年寫作生涯，真是感慨系之。我這一生寫許多小說，每日還要編報，寫文章、

詩詞，曾有人估計，我一生大約寫了三千萬言。有人問：你是如何堅持着沒有擱筆的呢？記得我在《春明外史》的序上曾以江南崇明島為例而寫道：舟出揚子江，至吳淞已與黃海相接，碧天隱隱中，有綠岸一線，橫於江口者，是為崇明島。島長百五十里，寬三十里，人民城市，田園禽獸，其上無不具有，儼然一世外桃源也，然千百年前，初無此島。蓋江水挾泥沙以俱下，偶有所阻，積而為灘，灘能不為風水捲去，則日積月聚，一變為洲渚，再變為島嶼，降而至於今日，遂有此人民城市，田園禽獸，卓然江蘇一大縣治矣。夫泥沙之在江中，與水混合，奔流而下，其體積之細，目不能視，猶細于芥子千百倍也，乃時時積之，居然於浩浩蕩蕩、波浪滔天之江海交合處，成此大島。是則漸之為功，真可驚可喜可懼之至矣。」

我對自己寫了這些書，也只有「成於漸」三個字好說。為了往往是先給報紙發表，所以敦促自己非每日寫六七百字或上千字不可，因而養成了按時動筆的習慣，而且可以在亂哄哄的編輯部裏埋頭寫小說，我就這樣寫了幾十年。

我作小說，沒有其它的長處，就是不作淫聲，也不作飛劍斬人頭的事。當然距離黨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工農兵，寫工農兵生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方針太遠了。幾年來在病中眼看著文藝界的蓬勃氣象，只有欣羨。老駱駝固然趕不上飛機，但是也極願作一個文藝界的老兵，達到沙漠彼岸草木茂盛的綠洲。

(一九六三年)